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陳國棟 主編

歷史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陳國棟 主編

歷史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 陳國棟主編。—— 臺北市：
中研院史語所，民 92
面；公分。——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
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ISBN 957-671-950-X (精裝)。—— ISBN 957-
671-951-8 (平裝)

1. 文化史 — 中國 — 論文, 講詞等 2. 外交 —
中國 — 歷史 — 論文, 講詞等

630.7

92000732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主 編：陳國棟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印 刷 者：萬達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4 之 1 號 2 樓

展 售 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 886-2-2782-9555#245 F: 886-2-2786-8834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T: 886-2-2321-9033 F: 886-2-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四分溪書坊

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地下室

T: 886-2-2783-9605 F: 886-2-2783-9620

Email: kk1133@saturn.seed.net.tw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

T: 852-2609-6508 F: 852-2603-7355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定 價：平裝 新臺幣 170 元

精裝 新臺幣 260 元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出版

GPN 1009200229 ISBN 957-671-950-X (精) ISBN 957-671-951-8 (平)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總 序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九日在臺北南港院區學術活動中心揭幕，會期前後三天至七月一日閉幕。這一次漢學會議的舉行距離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的上屆大會已有十四年之久，而與第一屆大會的舉行則已相隔廿年的時間。在這樣一段長久的時間內，國內外漢學界已有相當的成長與變化，正如本院李遠哲院長在開幕致詞中所說的：「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視野更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論與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乃結合人文學科各研究所，經兩年時間的籌備而召開本屆大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這一擴大的學術聚會，讓國內外漢學界研究同仁再有一次廣泛討論及交換意見的機會，以便共同探討籌劃「漢學研究在廿一世紀的新方向」。

第一、二兩屆國際漢學會議是由本院的三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

共同參與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參加籌備的單位除去上述三個研究所之外，又增加了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而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中亦邀請多位國內大學相關學門的教授參與。在會議內容的分組上也有變動，第一屆會議共分為六組，第二屆會議則改為五組，本次會議則增加為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學、族群關係（人類學組一）、信仰與生活（人類學組二）等七組之外，並有「漢籍數位典藏研討會」合併在會議中舉行，以展示本院推動現代資訊科技在漢籍典藏與搜集上的應用成果。在會議節目程序的安排上，本屆會議也略有創新，除去有兩次大會特別演講外，並有十四次「主題演講」以配合各組之下再分出的研討主題，分別邀請與主題相關的資深學者作演講，以突出並導引各研討主題的意義與研討。最後各組並各有一場綜合討論，以整合各領域研討的意見。

本屆大會共有國內外漢學研究者三百餘人與會，提出論文二百一十一篇。前兩屆漢學會議均將會議論文分組編印成冊出版。本屆會議各主題下之論文都具相當專業性與系統性，籌備會與各組主持人均希望早日刊出。茲為編輯會議論文出版事務，特由「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其副秘書長，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寬重教授及執行秘書、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教授，分別擔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與各所代表何大安、何翠萍、黃克武、李豐楙、邱澎

生等教授共同組成編輯小組主持編輯出版事務。邱澎生兼任此編輯小組秘書，與助理李雅玲小姐共同襄理協調聯繫事宜。各分冊之主編則由劉翠溶、石守謙、邢義田、劉增貴、臧振華、陳國棟、黃克武、鍾柏生、何大安、何翠萍、蔣斌、林美容、李豐楙、劉述先等教授分別擔任。本屆大會論文集在經費困難與出版形式之議定極費精神的情況下得以陸續出版問世，都是編輯小組同仁與各分冊主編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本人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至深謝忱。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得以順利召開與完滿達成，首先要感謝本院李遠哲院長與楊前副院長國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同仁們均十分感激。「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石守謙、李壬癸、呂芳上、徐正光、張玉法、黃俊傑、黃啟方、黃應貴、劉述先、劉翠溶、鍾彩鈞、戴璉璋、龔煌城諸教授，在籌備期間極備辛勞，而大會秘書處在黃寬重與王明珂兩位教授的領導下，在開會期間更是日夜不休地工作，更是令人欽佩，本人與大會籌備會副主席杜正勝院士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與會漢學界同仁也向他們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主席

李亦園 謹誌

2001.12.

編者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中國與域外」（A 及 B 兩個場次）原先有六篇論文發表。會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Morris Rossabi 教授因為教學負擔及夫人的健康問題，無暇就審查意見修改其大作，放棄在本集中刊出，十分可惜。我們為尊重制度與專業審查人，並為時間所迫，忍痛加以割愛，深感遺憾。可堪告慰者，Rossabi 教授題為“Sino-Mongol Relations, 1986-2000: A Mongol Perspective”的論文，稍後將另行收入其專著，讀者仍不致向隅。「中國與域外」場次論文原本較少，本集又僅得收錄論文五篇，是以篇幅遠比其他諸冊為小。

本集文章有三篇為中文，兩篇為英文。英文方面，作者有時使用英式拼法，有時使用美式拼法，編輯時一律改為美式。所有文字，遵從作者創作，除錯別字外，一概不予更動。

陶晉生院士為「歷史組：中國與域外」A 場次主持人。依大會分派之任務，撰寫一篇兼具回顧與前瞻性的論文。他的大作〈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省思：以宋遼金時期

為例〉，藉由檢討迄今為止的歷史考古成果與學術研究業績，針對遼、金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之研究提出其願景；同時透過此一研究，復為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發表其精到的看法。陶院士發現：遼、金文化與中原的漢人文化接觸之後，對個別主體都產生交互影響，並且互相融合。傳統研究一般都強調這樣一個文化變遷的過程是一種「漢化」的現象。陶院士基本上也肯定「漢化」是主要的發展方向，不過，他也強調遼（契丹）及金（女真）的文化也有向漢人文化挹注的地方。本文從考古發掘成果方面找到堅實的例證，論說也十分清楚嚴謹。

郝延平院士為「歷史組：中國與域外」B 場次主持人。同樣也為大會撰寫一篇兼具回顧與前瞻性的論文，論文題目為〈中國與域外：近代中國史上的內與外〉。雖然說是「近代」，實際指涉的時間大約從明初到二十世紀末的六百年，正好完全接續陶院士的大作。本文分別從四個方面來討論這六百年間中國歷史上的「內」和「外」的問題。他指出在定義上，「內」與「外」有很大的模糊性與流動性。就「內」與「外」的變動來觀察，明、清以來的中國史有很明顯的循環現象。在中、外的互動過程中，以及相應時代的史學研究上，也可以看出有內向型及外向型的差別，同時也存在相互交替或者共存共榮的現象。

拙文〈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Abang, Kiwi, Kongsì 與 Wangkang〉。原用英文發表，收入

本集時改為中文。拙文的宗旨主要在說明“Abang”是個道地的馬來字，原意為「兄長」或「大哥」，但被中國人借用來稱呼在帆船上擔任爬上桅桿眺望遠方工作的一種船員（中文寫作「亞班」或「阿班」）。“Kiwi”這個字事實上源自中文的「客夥」一詞，指結夥貿易團體之成員，在馬來文中用來指「二船主」，也就是指分租船艙附搭貿易的小本商人。“Kongsi”是一個常用的馬來字，但是實際上卻是「公司」一詞馬來化的用法，最初的意思是用來指稱中國人海外貿易的合夥組織。“Wangkang”又是一個固有的馬來字，然而主要被用來指中、大型的中式帆船。西元第十七世紀前後，這些名詞在中國及東南亞世界開始流行，證明中國與鄰近地區的熱絡交往，彼此有相互影響的現象。

濱下武志教授的宏文，題目是“*Ryukyu Merchants and Their Pepper Trade under Tributary Trade System, 15th-17th Centuries*”。這篇文章利用琉球《歷代寶案》中有關琉球與中國、朝鮮及東南亞國家關係的史料，討論明代前期海禁期間琉球貿易商一方面經營與東南亞數個港市的貿易，一方面也向中國進行所謂的「朝貢貿易」，透過這樣的機制，促成相關國家之間特定商品的流通。胡椒正是這一貿易機制中最引人注目的商品，產地在東南亞。由於十六世紀後歐洲商人已經東來，而海禁之下也還有中國商人違禁出海，因此濱下教授也拿歐洲商人、中國商人的東南亞貿易來和琉球人所從事的商業活動作一比較。

包樂史先生的大作，題目叫作“From *Hai-chin* to *Kaikin*: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rder Policy on Tokugawa Trade Polic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in Early Modern Times, 1600-1850”。原先的重點在說明明代中國的「海禁」政策對日本江戶時代鎖國性質的「海禁」政策的影響。若就同時性來說，江戶時代（1603-1867）與清朝（1644-1911）重疊的時間很長，與明朝（1368-1644）重疊的時間卻很短。但是因為要講中國對日本的影響，所以拿明代來和德川時代相互對照。刊出前，包教授作了部份更動，雖然仍然討論明代「海禁」思維對日本鎖國的影響，但加入更多的篇幅，把鎖國政策下的實際作為作了更加清楚精闢的說明。

以上五篇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探討中國與域外地區的關係。不過，正如郝延平院士所言，「中國」一詞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可以指政治版圖，也可以指涉文化範圍或經濟勢力之所及。由於在共通點上，各篇文章顯然都偏重文化方面的意義，所以在結集成書之際，我們選擇以「漢文化」作為標題的一部分來突顯這一層特色。至於集中諸文所探討的「域外」，包含了遼、金、朝鮮、日本、琉球與東南亞世界。不從政治版圖加以考量，這些「域外」為貼近「漢文化」地區居住的民族所佔居。為此，本集將篇名定作《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五位作者在不同的程度上，大致都同意：在中國與域

外互動的過程中，中國文化雖然具有一定的優勢，可是它並不只供周邊民族學習模仿，它同樣地也容受吸收一些外來文化的素質。有容乃大才是中國文化得以發榮滋長的關鍵；創造發明則是所有民族都具有的本能。

有關中國涉外關係的研究自來廣受重視。不過，屬於政治外交、屬於通商貿易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屬於文化方面的探討則相對不足；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較側重高層文化（如儒家思想），稍微忽略民間社會。事實上，由於通商、戰爭與移民等活動的展開，漢文化與周邊民族間的往來正不乏庶民性質的接觸，而尋常百姓之間也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影響或吸收對方的文化。發生在民間的這種文化上的交往，細水長流，微而不顯，值得更深入地探討。

承命編輯《漢文化與周邊民族》初成，值此付梓之際，謹贅數語如上。敬祈讀者審識。

陳國棟

民國 91 年 11 月 13 日

目 錄

總序.....	李亦園	i	
編者序.....	陳國棟	v	
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省思：			
以宋遼金時期為例	陶晉生	1	
中國與域外：近代國史上的內與外	郝延平	25	
從四個馬來詞彙看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			
<i>Abang, Kiwi, Kongsì</i> 與 <i>Wangkang</i>	陳國棟	65	
Ryukyu Merchants and Their Pepper Trade under Tributary Trade System: 15 th -17 th Centuries Takeshi Hamashita 濱下武志			115
From <i>Hai-Chin</i> to <i>Kaikin</i> :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rder Policy on Tokugawa Trade Polic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in Early Modern Times, 1600-1850.....Leonard Blussé 包樂史			173

《漢文化與周邊民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3，頁 1-23

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省思： 以宋遼金時期為例

陶晉生^{*}

本文以遼金兩代文化與宋代中原文化方面的關係為例，說明目前研究的成果和關於研究工作的討論和展望。

自古以來中原文化就和東北諸民族的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互動，契丹族和女真族的先世就已經受到中原文化以及東北鄰近民族文化的影響。二十世紀初葉學者開始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角度來研究宋遼金三朝的歷史和文化，其後隨著考古工作的展開，學者根據新的資料，包括文獻和實物，對於東北地區的歷史研究遂有了長足的進步。¹ 這些新

^{*} 美國亞里桑那大學。

¹ 關於民國以來對於遼金二史研究的簡介，參看拙著〈民國以來遼金

資料對於研究契丹和女真民族與中原漢族間的互動，以及文化之間的關係，有相當重要的貢獻。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舉例介紹近年來遼金文化史研究的收穫，以考古發現的遺址和實物為主。第二部分討論出土文字資料的貢獻。第三部分討論契丹、女真族和漢族間的文化交流的問題。

一、遼金考古的收穫舉例

過去數十年，考古學者對於東北地區的發掘和研究，有了豐富的成果。古代東北地區的考古調查，證明東亞文明的起源，不是以中原為唯一的中心向外發展，而是有多元的文化中心。認為中原地區文化水準高，文明起源早，中原周圍地區都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而發展的看法，已經需要修改。² 這種結論也值得今後關於遼金文化的研究工作者參考和借鏡。

史研究的回顧》，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頁 123-134。

² 參看許倬雲，〈接觸、衝擊與調適：文化群之間的互動〉，見臧振華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上冊，頁 67-82。Katheryn M. Linduff, “Here Today and Gone Tomorrow: the Emergence and Demise of Bronze Producing Cultures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 同上書，頁 393-428。郭大順，〈遼西古文化的新認識〉，收入《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 203-215。

考古學者們在東北地區發現了相當多的遼金城址和墓葬。這些城址和墓葬中出土的文物種類繁多，很多資料和實物是前所未見的，擴充了研究的範圍，也提供學者新的研究途徑。由於著者羈留海外，所見國內考古成就的報告有限，所以本文僅能略舉一些與中原漢族文化有關的契丹和女真民族遺留的例證來討論。

遼代建國時正值唐代衰退，中原大亂，文人百姓頗多北徙。遼初國主耶律阿保機招徠漢人，建城耕地，加以耶律德光一度入侵開封，將大批漢人官員、文士、工匠以及中原寶貨文物攜往東北，漢族大量移民到東北的結果是「城郭相望」。後來金代初期也將中原人士和文物遷徙到東北。城址的發掘和研究，對於契丹和女真在東北的發展，以及漢文化在東北的影響，有很大的貢獻。

過去關於遼代城市的記載，大致根據《遼史·地理志》，對於當時城市的描寫，不夠詳細。考古工作者近年來則發現了大量的城址：吉林的中部平原和西部草原地區發現了遼金時期的古城址百餘處，黑龍江的遼金城址一百數十處，內蒙古昭烏達盟就有城址五十餘處，遼寧有二百餘處。³

³ 馮永謙，〈三十年來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東北考古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一輯，頁97。

遼祖州是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陵墓所在，其建築模仿唐制而不完全，並且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石室」。這間石室可能是阿保機祭祖的祖廟，顯示在遼建國時已經模仿中原皇帝建太廟。⁴

遼上京在今林東鎮南，包括皇城和漢城兩部分，兩城共有周長 28 里，現存皇城城牆高約 10 米。城內大內位居中央偏南。外城即漢城，在皇城之南，城牆較低，約 4 米。外城由漢人居住，顯示契丹人與漢人分治的特點。⁵ 遼中京在今寧城縣，城有三重，外城周長 30 里 400 米，內城正中為皇城。城制模仿中原而不完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泰州城址，過去對於這一遼代北部的重要城市說法不一，今於黑龍江泰來縣塔子城發現的城址，出土遼「大安七年」石刻，內有「泰州河堤」、「提點塔事」等語，可以證明此地就是遼泰州。⁶

遼代佛教興盛，佛寺和寶塔的建築很有特色，在東亞

⁴ 參看張松柏、馮雷，〈祖州石室與鮮卑石室——契丹族源探索之二〉，張志立、王宏剛等主編，《東北亞歷史與文化：慶祝孫進己先生六十六誕辰文集》（瀋陽：遼瀋書社，1991），頁 414-420。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243-253.

⁵ 劉素俠，〈從考古材料看契丹民族城鎮建設的基本特點〉，《北方文物》2（1990）：41-44。

⁶ 馮永謙，〈三十年來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頁 97-98。

建築史上達到一個高峰。關於遼代的建築，過去的研究很多。⁷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也就是著名的應縣木塔，在一尊佛像裏面發現的一百六十件文物中，包括《契丹藏》，這說明了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契丹印刷術已經有極高的水準。⁸

據史籍，傳說契丹民族原來的葬俗，是不用棺槨土葬的。在十世紀中，契丹文化飛躍發展，可以從墓葬的變化看出來。關於墓葬的例證，以可以確定為契丹的墓葬為主，東北地區漢人的墓葬大致與華北類似，不在本文討論。其特點為遼代漢人頗多採取火葬，或者影響到中原的火葬實例的增加。⁹

早期契丹人的墓葬，如陳巴爾虎旗西烏珠爾發現的三座遼墓葬，葬式用獨木棺，隨葬有木弓、鐵鏃、馬鐙與革帶銅節飾件等，並有陶器和瓷器。據研究，這些陶器並沒有受到中原的影響，¹⁰ 隨葬品大都是實用物品。從早期到中期，出現金銀器。¹¹ 早期有的契丹貴族的墓葬受到唐代

⁷ See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⁸ 馮永謙，〈三十年來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頁 93。

⁹ See Steinhardt, *Liao Architecture*, pp. 311-315.

¹⁰ 馮永謙，〈遼代陶瓷的成就與特點〉，《遼海文物學刊》2（1992）：116。

¹¹ 李逸友，〈內蒙古遼代契丹人墓葬的形式和分期〉，見孫進己、馮永謙、蘇天鈞主編，《中國考古集成——東北卷》（以下簡稱《集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 15 冊，頁 769-781。